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大学——思想与制度书系 | 崔延强 主编

English University Life In The Middle Ages

中世纪英国 大学生生活

Alan B. Coban / 著 邓磊 杨甜 /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CIA1400181)阶段性成果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教育学青年课题“古典大学生生活史与中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成果

中世纪英国大学生生活

艾伦·B.科班 著

(Alan B. Coban)

邓磊 杨甜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世纪英国大学生生活/(英)科班(Alan B. Cobban)
著;邓磊,杨甜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7. 3
(“大学:思想与制度”书系)
书名原文: English University Life in the
Middle Ages
ISBN 978-7-5689-0423-0

I. ①中… II. ①科…②邓…③杨… III. ①大学生—学生
生活—英国—中世纪 IV. ①G6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8376 号

中世纪英国大学生生活

艾伦·B. 科班(Alan B. Coban)著

邓磊 杨甜译

策划编辑:唐启秀

责任编辑:杨敬 邓桂华 版式设计:唐启秀

责任校对:秦巴达 责任印制: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易树平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940mm×1360mm 1/32 印张:8.375 字数:223千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89-0423-0 定价:3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译

者序

教育不仅在课堂上,还应在生活中。雅思贝尔斯曾经提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要包含三个彼此密不可分的方面:学问传授,科学与学术研究,以及创造性的文化生活。这个观念既是对大学的一种期许,同时也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底蕴。事实上,在早期阶段大学的性质更倾向于师生共宿、欣然同游的学者社群,而非以教学科研为必备功能的社会机构。认清这一点,对于分析大学思想与制度的起源至关重要。

制度源于思想,思想根植于生活,对大学制度和思想的研究不可割舍大学生活。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关于大学生活的历史研究国内学者较少涉足,而西方学界已经给予较多关注。大学生活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是生活史研究,此类研究多见于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领域,其方法就是对人与机构的历史场景、生活经历和文化状况进行详尽的记述,并对影响个人生活或团体活动的各种因素展开分析。关于大学生活的历史研究最早可见于红衣主教纽曼的《大学之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1852),其中用充满感情色彩的笔触对英国古典大学的教育理念、生活场景和学生经历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拉斯达尔的名著《中世纪的欧洲大学》(*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1898)也大量记载了有关中世纪大学的生活细节,对大学的财产来源、社会习俗、生活场景和学者生活等都进行了十分详细的描述。除此之外,哈斯金斯的《大学的兴起》(*The Rise of Universities*, 1923)、涂尔干的《教育思想的演进》(*L'Evolution pédagogique en France*, 1938)在此方面亦有所涉及。不过,直至20世纪中期,西方大学史研究主要还是以整体性的综合研究为主。

20世纪中后期,西方大学史研究有一个基本转向,即从宏观描述转向专题研究。该转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个古典大学先后推出校史专题研究,如阿斯顿(T. H. Aston)主编的

《牛津大学史》以及里德(D. R. Leader)等编著的《剑桥大学史》;另一趋势就是从城市文化分析大学生生活的专题研究开始兴起。与前者的连贯性和单一性相比,大学生生活史研究显示出极大的广泛性和灵活性。有学者从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入手,也有学者从大学内部的社群生活出发。在此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科班(A. Cobban)所著的《中世纪英国大学生生活》。

《中世纪英国大学生生活》主要具有三个方面的特色。其一,就是尽可能广泛和细致地真实还原中世纪英国大学的内部生活场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作者不仅查阅了存放于大学和书院的文献档案和规章制度,而且收集大量公私信函、论文著作、政府记录和行业卷宗等与大学生生活有关的资料,力图对学者社群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综合探究。其二,除了描述大学内部的生活场景,作者还普遍介绍了为英国大学有效运行作出重大或独特贡献的外部人员,譬如书院创始人、基金捐赠人、服务人员、学者侍从、手工匠人和中学教师等。其三,着重分析大学人员与外部社会的交往与互动。

通过对大学生生活的细致描述,科班打破了有关学术共同体的虚幻想象,厘清了大学的存在本质,同时也指出了生活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中世纪英国大学)是由授课教师基于学者群体内部的学术利益进行内部自治的学者行会,外部的出资人无权干涉大学内部事务,甚至对于内部非学术管理人员的依赖性也微乎其微。此种组织形式有利于促进大学的教学和学术,也为现代大学提供了颇有意义的参考和启迪。”

总体而言,《中世纪英国大学生生活》在研究方法上独辟蹊径,从生活史的视角探寻大学的文化传统和育人模式,为澄清大学的本质特征,反思现代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及构建大学教育场域和文化传统提供了极好的素材。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正在深化综合改革,致力于创新人才机制、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这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过程。大学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应当关注内涵的积淀。概言之,无论是以传承文明的思路进行扬弃和重构,还是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心态进行学习借鉴,本书都值得一读。

邓磊

2017年2月27日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

前 言

撰写此书的目的是，在尊重原始资料的前提下尽量真实地点评中世纪牛津和剑桥的的大学生活。要实现这个雄心勃勃的创举，我们需要翻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包括大学以及各个书院的档案资料和法定章程，还要了解有关大学生活的公文信函、教育论文、王室宪章与令状、市政记录、法医案卷，以及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关于大学和学者的重要事件记录卷宗。由于所有有关15世纪之前的学者日记和师生回忆录都没有保存下来，因此无论是学术方面还是非学术方面，无论是针对本科学生、指导教师、大学校长还是其他事务人员，我们都无法准确地描述他们具有典型意义的一日生活。然而，即使现存的资料无法事无巨细地尽述中世纪英国大学生活，并最终形成统一的定论，但通过广泛搜集资料，对英国大学学术共同体的方方面面的生活片段进行综合分析，还是能够起到见微知著的效果。本研究不仅对居住在书院（college）、学堂（hall）和寝舍（hostel）内的本科学生、授课教师、书院成员和自费学生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情形展开研究，同时还在那些为英国大学有效运行作出重大贡献的学术外围人员身上倾注了同等精力。许多教师和学生及书院创始人、基金捐赠人、扮演多重服务角色的妇女、大学和各书院的工作人员、手工工匠、来自“大学附属学校”的教师等各种相关人员，为英国大学学术社群的多姿多彩、基业常青作出了卓越贡献。

虽然从非正式渠道所获得的信息可能更加丰满详细，但本研究还是主要查阅官方资料，力图准确地掌握当时各个学科教学方法和课程建设的精准信息，无论是在艺学这个基础系科，还是在神学、法学和医学等高阶学科。当然，这个想法并非尽善尽美，静态的档案资料难以准确呈现大学教导与学习的历史演进。

不过,却足以客观再现教化过程的核心环节。本书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用细腻的笔触在充斥着形形色色暴力冲突和犯罪记录的历史档案中,窥测大学与城市赖以互惠互利的纤薄轮廓。对于中世纪的英国大学和城市而言,何时奉行互惠合作,何时崇尚暴力冲突,是一个很难轻易作答的有趣话题。

中世纪英国大学对待各种娱乐休闲行为的克制态度。这是本书另一个相当有意思的话题,此种情形的出现,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大学纪律严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世纪时代无所不在的修院风气主张节制欲望和压抑内心。因此理想的模范学生应当过着一种摆脱尘世纷扰的清修生活。尽管如此,大学、书院和学堂都没有发布命令禁止所有娱乐活动。事实上,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学者娱乐活动也是本研究考察学生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书着重强调一个观点:中世纪英国大学实质上是由授课教师基于学者群体内部的学术利益进行内部自治的学者行会,外部的出资人无权干涉大学内部事务,甚至对于内部非学术管理人员的依赖性也微乎其微。此种大学组织形式有利于促进教学和学术,也为现代大学提供了很有意义的参考和启迪。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海斯汀·拉斯达尔(Hasting Rashdall)、罗伯特·S.雷特(Robert S. Rait)和查理·H.哈斯金斯(Charles H. Haskins)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学家为中世纪大学生生活研究奠定了基础。自1961年起,笔者开始从不同角度研究中世纪大学历史,包括英国大学,也涉及欧洲大陆各国。本书旨在结合众多历史学家先期成果,将自己多年的研究呈现出来,以期在前辈先贤们开辟的这片学术领地中作出一些实实在在的贡献。

我要感谢马克·菲奇基金会(Marc Fitch Fund),由于其慷慨资助,本书才得以顺利搜集到各种文献资料。

Alan B. Coban

1998年于利物浦大学

English University Life in the Middle Ages / by Alan Cobban / ISBN: 1-85728-517-4
Copyright© 1999 by UCL Press.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UCL Press, part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原版由 Taylor & Francis 出版集团旗下, UCL 出版公司出版, 并经其授权翻译出版。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重庆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并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贸核渝字(2016)第 282 号

目 录

1	本科生活	1
2	研究生生活	57
3	寄宿生:本科自费生与成人自费生	96
4	学术外围人员	125
5	教导与学习	154
6	市校关系与学者娱乐	187
6.1	大学与城市	187
6.2	休闲娱乐	202
7	治理与行政	216
	参考文献	237

1 本科生活

最初,中世纪英国大学只招生男性学生,此传统一直延续到19世纪。1832年,新成立的伦敦大学和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率先打破性别垄断,之后这两所大学一直致力于为女性争取高等教育权利。¹ 不过,直至19世纪七八十年代,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才对女性学生敞开庄严神圣的大门。剑桥大学纽汉姆书院(Newnham)、格登书院(Girton),牛津大学玛格丽特夫人学舍(Lady Margaret Hall)和萨默维尔书院(Somerville)是英国大学最早招收女性学生的部门。² 在中世纪后期的英国,中上社会阶层的女性基本上都能获得不同程度的教育,她们接受教育的渠道主要是通过父母、监护人、保姆、家庭牧师或教区牧师,偶尔也可以受到男性教师或者女性同伴的教导。当时的女性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教育拓展,譬如去同等或更高社会地位的家庭寄居一段时间,或者是在女修院居住一段时间,因为那里的

1 See S. Rothblatt, "London: a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in *The university and the city: from medieval origins to the present*, T. Bender (ed.) (New Yor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29.

2 C. M. L. Brooke&R. Highfield, *Oxford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10-319; V. H. H. Green, *Oxford University* (London, Batsford, 1974), pp. 185-6; M. Sanderson, *The univers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Boston, Routledge&Kegan Paul, 1975), pp. 173-177.

教育设施通常都向不同性别的年幼平教徒开放。¹除了正规的教育内容,年轻女孩也学习宗教、仪态、音乐、舞蹈以及其他相关的社交礼仪。在此需要申明的是,虽然富裕家庭的女孩大多在早年就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教育基础和社交能力,但却坚决不被纳入正式教育的范畴,所有的大学都不向女生敞开大门,绝大多数的公学也不接纳女性学生。²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因素也强化了中世纪英国大学生活的雄性特征。与许多欧陆大学一样,牛津和剑桥也承袭了数世纪以来一直弥漫于教育领域的修道精神。11—12世纪诞生了一批大教堂学校和城市学校,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学校逐渐发展为最早的大学。上述大学先驱学校的兴起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欧洲教育的苦修气质。³不过,在被赋予了公共生活模式的牛津大学住宿学舍(halls)、剑桥大学住宿寝舍(hostels)以及两所大学的住宿书院(colleges)中,修院遗风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修道传统对抑制享受肉体愉悦的倡导,也深刻体现在大学和书院许许多多有关非学术活动的规章制度中。⁴不仅如此,在中世纪牛津和剑桥本科生社群中,僧侣、教士和托钵修士占据了十分显著的统治地位,这也昭示了在当时的英国大学本科教育中必然充斥着浓厚的宗教文化气息。

除了受修道传统影响,英国大学的本科生还在一定程度上与在俗教士相类似。尽管英国大学从很早就努力将自己定位为

1 N. Orme,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England* (London & Ronceverte, West Virginia, Hambledon, 1989), pp. 153-175, 224-242; see also H. Leyser, *Medieval women: a social history of women in England 450-1500*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5), pp. 138.

2 See the examples cited by N. Orme, *English schools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Methuen, 1973), pp. 54-55; see also J. A. H. Moran, *The growth of English schooling 1340-154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69-70.

3 关于主教座堂学校参考 G. Paré, A. Brunet, P. Tremblay, *La renaissance du xii siècle : les écoles et l'enseignement* (Paris, Vrin, 1933); E. Lesne, "les écoles de la fin du viii siècle à la fin du xii", in *Histoire de la propriété ecclésiastique en France* (Lille, facultés Catholiques de Lille, 1940); S. d'Irsay, *Moyen âge et renaissance, vol. 1 of Histoire des universités française et étrangères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Paris, Picard, 1933). See also J. Verger, "les écoles cathédrale méridionales. Etat de la question", *Cahiers de Fanjeaux* 30, 1995, pp. 45-68.

4 See below, Chapter 6, pp. 198-211; "Recreations and entertainments".

实质上的世俗法人机构,然而其成员,连同欧陆各国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仍然是以获得梦寐以求的牧师身份为目标¹。因为拥有在俗教士身份,英国大学学者同时还被视作圣职人员,不过许多人仅仅是凭借初次受戒而获得低阶神品。² 圣职身份可以使本科生以及所有级别的真正学者都免受世俗权力的管辖,这意味着英国学者的审判权属于教会法庭。从大学的角度来看,在多数时候校长办公机构都应当被视为教会的派生机构。基于这种认知,同时也因为绝大多数学者的职业前景都在教会,因此英国大学的学者社群也可以被视为教会体系的一个分支。在牛津和剑桥市民眼中,大学学者被看作由精英人士构成的兄弟会组织,其在很大程度上与神秘秘的教会机构一样,蛮横无理地攫取了许许多多不知所谓的学者特权。³ 根据英国学者的自我印象,大学乃是一个不受教会控制的独立组织,然而大学成员与教会之间的广泛联系却恰与这想法背道而驰。即使真正的事实不甚明了,我们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中世纪英国大学的本科学生和毕业生视为某种形式的教会人员。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乐于与教会保持一致的视角,将大学教育视作男性专属,女性则由于性别和性格原因被排除在外。

一直以来,英国的本科学生都认为自己属于特权阶级,生活在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学当中。具有神话色彩的牛津剑桥起源传

1 1214年6月,牛津大学学者被教宗使节授予牧师特权。这项旨意是牛津大学的第一份特许状,下列书籍均有提到。H. E. Salter (ed.), *The medieval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2 vols), Oxford Historical Society 70, 73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7-1919), I, pp. 2-4, and by H. Anstey (ed.) *Munimenta academica;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academical life and studies at Oxford* (2 vols) (London, Longman, 1868), I, pp. 1-4。此时,剑桥大学并没有得到皇家特许状,不过据推测剑桥学者获得牧师特权不会晚于1225年,见A. B. Cobban, *The medieval English Universities; Oxford and Cambridge to c. 1500* (Berkeley, Calif. & Aldershot, Eng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cholar Press; 1988), pp. 258。

2 关于诵经员(first tonsure)可以参见R. N. Swanson, *Church and society in late-medieval Englan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pp. 41-42。

3 参见第6章, PP. 183-197。

说,在中世纪后期就已经广为流传。¹ 学生们深深痴迷于这些传奇故事,他们笃信牛津大学要么是由阿尔弗雷大帝(King Alfred)建立于公元873年,要么就是在布鲁特斯国王(King Brutus)和逃出生天的特洛伊人协助下,由希腊哲学家创办的。而传说中的特洛伊逃亡者,甚至有可能就是构成不列颠人的一个分支。剑桥大学的学生也对母校的起源神话兴致勃勃,他们认为,剑桥大学是由追随英王女婿堪特伯王子(Prince Cantaber)从西班牙流亡到英国的一群雅典哲学家创建的。据说这所大学在公元531年、公元681年和公元951年,亚瑟王(King Arthur)、卡德瓦拉德国王(Cadwallader)和爱德华国王(King Edward the Elder)先后向剑桥大学授予特许状。²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说法,即剑桥大学于公元7世纪由东盎格鲁(East Angles)国王希伯特(Sigebert)所创建。³ 上述杜撰从16世纪到18世纪不断被古董商人进一步加工渲染,其用意一方面在于证明牛津和剑桥所遗留下来的古代遗物皆异常珍贵;另一方面也意在标榜这两所大学都在欧洲历史上具有不亚于任何其他机构的崇高地位。事实上,根据一部关于牛津大学起源的历史记录“historiola”的记载,这所学校至少可追溯到公元1313年,仅此就足以号称天主教世界最古老的大学之一。⁴ 上述宣传能让英国本科生深感自己所处的大学富有魅力和生命力,并为母校在整个欧洲无可企及的光荣传统而深感自豪。

不过,事实却并非如此。直至12世纪末,牛津大学才发展成为羽翼丰满的学者公会(university)或学科研习所(studium generale)。最初,牛津开设的学科包括艺学、民法学、教会法学

1 关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神话起源参见 Cobban, *Medieval English universities*, pp. 20-26 and notes; J. Parker, *The early history of Oxford 727-11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5); C. H. Cooper (ed.), *Annals of Cambridge* (4 vols) (Cambridge, Warwick, 1842-53), I, pp. 1-3.

2 这些传说记录在 G. Dyer (ed.), *The privilege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 vols) (London, Longman, 1824), I, pp. 55-58.

3 Cobban, *Medieval English universities*, pp. 24; Cooper, *Annals of Cambridge*, I, pp. 2.

4 这些史实可参见 Anstey, *Munimenbgsta academica*, II, pp. 367-369 and by S. Gibson (ed.), *Statuta antiqua universitatis oxoniensi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1), pp. 17-19.

和神学,直到13世纪末才将医学纳入正式的教学范畴。¹ 大致而言,牛津应当能与博洛尼亚、巴黎和蒙彼利埃一同跻身于欧洲最古老的高等学府之列。剑桥大学的创建则是在1209—1220年,源自牛津大学师生出走事件。² 起初,剑桥大学只开设艺学、教会法学和神学,在12世纪后半段又逐渐增加了民法学和医学。剑桥大学的诞生于中世纪欧洲的第二波大学兴建浪潮,同时期出现的大学还包括卡斯蒂尔的帕伦西亚大学(Palencia in Castile, 卡斯蒂尔系中世纪时期位于西班牙中北部的古王国),以及意大利的雷吉奥大学(Reggio)、维琴查大学(Vicenza)、帕多瓦大学(Padua)和那不勒斯大学(Naples)。其中那不勒斯大学于1224年由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创办,它是欧洲当之无愧的第一所直接创办而非逐渐演变而成的大学。³ 英格兰以促狭之地、寡民之邦竟然孕育了两所欧洲最古老的大学,这的确值得大书特书。不过,仅此尚不足以表达英国人对本国知识文化遗产的爱国热忱。14—15世纪的百年战争催生了欧洲人的民族主义情结,急需通过各种途径加以宣泄,各个国家的大学皆成为宣扬民族情感和地域精神的重要源头。在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自然而然地成为民族主义者的大本营,为宣扬一度不被承认的英国民族意识作出了重大贡献。通过编造学术神话,英国学生获得了一种虚构的历史荣誉感,导致他们认为本国文化毫不逊色于任何其他位于拉丁基督世界(Latin christendom)的国家。

1 关于牛津的发展起源可参见 Cobban, *Medieval English universities*, ch. 2; R. W. Southern, "From schools to university", in *The Early Oxford schools*, J. I. Catto (ed.), vol. 1 of *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p. 1-36; G. Leff, *Paris and Oxford Universities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New York, John Wiley, 1968), pp. 76-82; H. Rashdall,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3 vols), 2nd edn, F. M. Powicke & A. B. Emden (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III, pp. 5-48.

2 参见 Cobban, *Medieval English universities*, ch. 2; D. R. L. Leader, *The university to 1546*, vol. 1 of *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 1; M. B. Hackett, *The original statutes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the text and its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J. A. Brundage, "The Cambridge faculty of canon law and the ecclesiastical courts of Ely", in *Medieval Cambridge: essays on the pre-Reformation university*, P. Zutshi (ed.) (Woodbridge, Suffolk, Boydell Press, 1993), pp. 21-45.

3 Rashdall, *Universities*, II, pp. 22.

在某种程度上,中世纪学生的生活经历也取决于他们在社会经济结构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在国家奖学金出现以前,学生必须从私人渠道设法筹集资金,以缴纳学费和维持生活。这笔资金常常来自几个不同渠道:父母、亲属、监护人以及赞助人。赞助人是指愿意为贫困学生提供求学资助的人士,可能是神职人员,也可能是在俗人士。尽管我们并没有找到有关学生家庭背景的统计档案,不过仍然可以确定16世纪之前英国和北欧的大部分学生都出身于社会中下阶层。通常情况下,大部分英国本科学生的家庭出身都是小贵族、商人、手工业者、各级政府雇员、律师、教师、医生、贵族封地的公务人员——如管家、治安官和地区长官等。除此之外,也有来自富农和自由民家庭的孩子,神职人员的后代或被监护人,以及城市里富裕程度和经济地位不尽一致的财东少爷。¹ 如果出身贫困家庭的能干小子在家乡找不到赞助人,就只能以某个托钵修会的修士身份进入大学。直到15世纪末和16世纪,贵族出身的孩子才开始大举进入英国大学。纵观13—15世纪的英国大学,贵族学生只占很小的比例,这与中世纪时代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的大学以及法国地方大学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²

15世纪末期以前,贵族出身的英国大学生相对较少,这对学生社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牛津、剑桥的本科生社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保持了不以贵族特权为荣的平民气质。从都铎时代(Tudor age, 1485—1603年)至20世纪初,这段时间英国大学的贵族特权最为泛滥。尽管中世纪的英国学生在大学共同体中也会因为年龄和才智的不同进行自然分离,但是社群等级结构的形成却并不完全依赖家庭出身。托钵修士和修

1 参见 Cobban, *Medieval English universities*, pp. 302; T. H. Aston, G. D. Duncan & T. A. R. Evans, "The medieval alumni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80, pp. 50-51.

2 参见 A. B. Cobban,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 thei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 (London, Methuen, 1975), pp. 62, 169, 201-202; J. Verger, *Les universités au moyen âge* (Vendôm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3), pp. 176-187. For the nobility in German universities see J. M. Fletcher, "Wealth and poverty in the medieval German universities", in *Europe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J. R. Hale, J. R. L. Highfield & B. Smalley (eds) (London, Faber & Faber, 1965), pp. 410-413.

院僧侣凭借他们的宗教使命、成熟品格和渊博学识获得了超然地位,上层贵族和显赫家庭的后代虽然人数不多,但却展露出显而易见的特权意识。不过大致而言,中世纪英国大学本科学生的生存环境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英国社会严苛的阶级区分。这意味着16世纪以前的英国大学相对开放和包容,其重视的是学生的才能而非出身。只要报名的学生是男性,至少有少量的资金支持,掌握了足以听懂教师当堂授课的拉丁语法就基本能够满足大学入学标准。¹

早期英国大学这种极具亲和力的入学标准与其招生方式紧密相关,学生是否能被录取是由个体教师单独决定,而不是由大学机构制订统一标准。易言之,一个13世纪的英国学生能否进入大学就读,主要取决于他与教师之间的协商;只要那位负责选拔学生的教师认为该生具备学习天赋,就会将其登记到录取名册或学生名单当中。学生入学和教师招生实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意味着该学生必须在大学里参加招收自己的教师所开设的普通(正式)授课讲座,反过来导师也必须保护学生,对学生的在校行为负责。

英国大学现存的第一份本科生入学档案,是出现于1231年的一则牛津大学官方文献。1236—1254年,剑桥大学也首次出现了类似的记录。²以牛津大学为例,一旦本科生被列入摄政(授课)导师的录取名单,就意味着该生必须每日至少参加一次该教师的正式授课。在剑桥,新生一周至少要参加三次以上导师授课。以上两则文献是英国大学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入学制度和录取名册,根据其具体内容可以推测:早在1215年,教宗使节

1 参见 Cobban, *Medieval English universities*, pp. 352-355; R. C. Schwinges, "Admission", in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H. de Ridder-Symoens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I, pp. 171-177.

2 关于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安排可以参见 the statute of a. 1231 in Gibson, *Statuta antiqua*, pp. 82, and for later legislation on this subject, pp. 60-61, 83. 关于剑桥大学的入学考试情况可以参见 Hackett, *The original statutes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p. 210-211, 相关评论, pp. 72-74; 也可以参见 *Liber procuratoris antiquus*, Cambridge University Archives, Coll. Admin. 3, fol. 25, and Queens Commissioners (ed.),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university and colleges of Cambridge* (3 vols) (London, Longman, 1852), I, pp. 332-333 (cited hereafter as Camb. Docs)

罗伯特·库松(Robert of Courcon)就曾在授予巴黎大学的法令中提到学生录取名单。¹

根据上述两条文献资料,也可以推测出牛津和剑桥在本科学生录取方法上的区别。在剑桥,学生自报到之日起有15天的时间来选择自己的注册导师,而牛津则没有类似的规定。剑桥大学的学生入学相关规定与博洛尼亚大学1405年颁布的一则条款颇为相似,后者也准许艺学和医学系科的新生在入学15天内选听不同导师的专业课程,然后再申请注册到哪位教师名下。²如此一来,教师们为了赚取学费,就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来争取潜在的学生顾客。在博洛尼亚大学,教学行为也被视作一种可交换的知识商品,按照这个逻辑,新生们在作出购买决定之前对讲座内容进行试听,当然是合乎情理的。不同的是,博洛尼亚大学的本科学生普遍年龄较长,在分析自己与导师的契约责任时更加成熟和严谨;而剑桥大学的本科学生则普遍年幼,因此他们的试听过程不可能像前者那样理性。无论如何,授课教师在学生试听时间上的慷慨大方,也显示了校方对学生入学双向选择程序的重视程度。是否将自己的姓名登记到导师的录取名册上,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区分正式学生和冒牌学生的唯一标准,也是分辨哪些人是借大学名义来获取特权保护的不二法门。学生只有将自己的姓名登记在某个系科的某位导师名下,才真正意味着正式进入大学学者共同体。与上述规定相类似的录取制度同样广泛存在于欧洲大陆的诸所大学,不过也有案例表明法定的规章制度与具体的操作方式也有可能不尽一致。譬如,15世纪的阿维尼翁大学(University of Avignon)曾要求法学系科学生必须获得学士学位才算完成注册,但按照其颁布于1441年的大学章程,学生在大学城安顿下来之后的30天

1 J. Paquet, *les maricules universitaires* (Turnhout, Belgium, Brepols, 1992), pp. 14. 关于巴黎1215法令参见 H. Delalain, 1889-1897), I, pp. 178-179, trans. in L. Thorndike (ed.), *University records and life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Octagon, 1971), pp. 27-30.

2 C. Malagola (ed.), pp. 28. 也可参见 A. B. Cobban, "Elective salaried lectureships in the universities of southern Europe in the pre-Reformation era",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 of Manchester* 67, 1985, pp. 684.